

近40年山東農村逐漸消失的事物和詞語

Word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from Shandong agriculture in the past 40 years

馬 鳳如

Fengru Ma

4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大地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语言上也及时、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当我们环顾一下四周，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本常见的那些事物、那些说法不少已经悄然消失。如“介绍信”、“学习班”、“外调”、“粮票”等似乎昨日还在使用，至于何时“理发店”变成了“美发厅”、“照片”变成了“写真”、“机场”变成了“空港”、“大龄男女”变成了“单身贵族”？谁又说得清、道得明呢！这一切变化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中国人大都有怀旧情结，喜欢回味过去，总结历史，以史为鉴。词语是时代的晴雨表，词语的演变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人们从词语的演变中能够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聆听到历史前行的足音。笔者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北部农村（以山东为中心），从最常见的生活琐事的变化中探寻时代前进的足迹。梁鸿（2010）在《中国在梁庄》中感叹道：“从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醇厚、朴素、亲情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在她眼里，中国的乡村在加速衰落，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本文选取了“喜事与丧事”、“农妇的家务活”、“阶级的烙印”、“发型头饰”等几个侧面加以分析，探求词语消失的背景条件、替代形式及演变的意义，客观地解读语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1. 喜事与丧事

人们历来对生与死格外重视，尤其在农村。但近些年，这方面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以下从3个方面来观察那消失了的传统习俗。

1-1 “拾娃娃的”“老娘婆”

鲁西南地区（单县）儿歌中唱道：“老娘婆，倒吃馍，花狗狸狗寄给俺一个。”（注1）“老娘婆”就是以前的接生婆，山东方言又称“老牛婆”（威海）、“收生婆”（枣庄）、“拾娃娃的”（金乡）、“抱娃娃的”（济宁）等。30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位中、老年妇女的“老娘婆”。

以前，农村妇女生孩子几乎都在家里。孕妇也没条件做产前检查，大多是在快要“瓜熟蒂落”时才请“老娘婆”前来看、摸摸。“老娘婆”与城镇里的“稳婆”不同，她们大多只是为乡亲们尽义务，做做善事，以此作为生计的却不多。由于妇女生产是“不洁”之事，一般家庭都要送红包表达谢意。千百年来，无数新的生命都是她们亲手迎到这个世上来的，因此她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几年前，笔者故乡的一位“老三姥

娘”去时，前来吊唁、送葬的几百人中，很多人是经她的手来到这个世界的。但也不容置疑，由于她们技术落后、用具原始、加上农家条件太差，接生时发生意外的比例较高，时有难产、胎死腹中、血崩等不幸发生。著名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曾精彩描写了李瓶儿难产、接生婆被打的一幕。所以，中国人又把生日称作“母难日”，把妇女分娩比作是到“鬼门关前走一遭”。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保母子平安，农村妇女也像城里人那样，到技术先进、设备齐全的医院妇产科去生产了。从此，传统的“老娘婆”便失业了。

1-2 “丢娃娃”的陋俗

据《中国青年报》（2010-4-8）报道，2010年3月29日，济宁市发生了一起遗弃婴儿遗体的蹊跷事：21具婴儿遗体被扔在了洸府河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起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广泛关注。据调查，这是市内某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与死婴的家长达成口头协议后雇人遗弃的。事后虽然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市卫生局也从法规和制度层面规范了病死婴幼儿遗

体的处置措施，但人们不禁要问，在孔孟故里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会出现如此残忍的一幕？但如果了解了当地的旧俗，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以理解。换句话说，这种婴儿遗体的处置方式是有古俗（“丢娃娃”的旧俗）可循的。

丢娃娃，又称“丢啦”（威海）、“殇”（枣庄）、“扳啦”（曹县）等。旧时，一般百姓家的婴幼儿死了，人们迷信地认为，这些夭折了的“娃娃”不是人，他们是来讨债的“短命鬼”，是“冤孽”。因此不能埋入地下，更不能葬入家族坟地。处置的唯一办法是：用谷草简单地把尸体包裹之后丢弃在荒郊野外的“乱葬岗子”上，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消失。正因为如此，过去人们对“乱葬岗子”的印象是阴森可怕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那场急风暴雨似的的冲击，封建迷信连同一切“牛鬼蛇神”都被打倒了、扫荡了，乱葬岗子不见了，“丢娃娃”的旧俗也便随之消失了。这次发生在济宁洸府河的事件实属一次古俗陋习的死灰复燃。

1-3废了“老林”，平了“坟头”

去孔子故里曲阜朝圣或观光的人们，必看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三孔之中，规模最大的是孔林。在这片占地3000亩的孔家氏族茔地里，有数万座大小不一的坟茔，里面安葬着包括孔夫子在内的孔家历代先祖。很多坟茔的前面耸立着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故人生前的主要业绩和公德（不过现在的孔家老人去世后，业已享受不到这份荣誉了）。千百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家的“林”或“老林”（坟地）大致也像孔林那样，但在规格上小得多。如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孔家老林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完好地保留着，而普通百姓家的“林”却早已不见了踪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1966年开始的那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社会秩序等冲击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就连故人的安息之地的“林”（坟地）也没能幸免。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坟地里那些歌功颂德的石碑基本上被当作“四旧”中的封建残余推倒了，接下来又被“废物利用”拉去修水库或盖猪圈等。70年代末，农村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又开始了“向死人要地”，各地纷纷把大面积的坟地改成了农田。先人们安息的坟茔被铲平了，上面种上了庄稼。如今，广大的

农村地区虽说普遍实行了火葬，但有不少老年人仍盼望死后自己的骨灰能埋入地下，也算“入土为安”了。所以，直到现在还能偶尔看到零星的土馒头状的孤坟。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坟头下面埋的大多是经过火化的骨灰，而不是遗体，而且为了不影响种庄稼，坟头存在的时间一般只保留3年。所以，每到清明节来临，人们即使想到先人的坟前烧点纸钱、扫扫墓，可很难找到地方了。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老林”、“坟地”、“墓地”等早已淡忘，对“坟茔”、“丘子”、“坟头”等也基本模糊了。

上世纪6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鲁迅先生踢鬼的故事。讲的是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一个漆黑的夜晚路过一片坟地时，一个盗墓贼装鬼吓唬他，结果被他狠狠地踢了一脚。在四五十岁的人的脑子里，对坟地大都还保留着一种既神圣又阴森可怕的印象。可20岁以下的人，已经不知道“林”、“老林”为何物，偶尔能见到的也许仅是零星的孤坟，所能听到的大概只剩下那几个让他们费解的鬼故事了吧。

坟地铲平了，扩大了农作物耕种面积，是件好事，但人们又到哪里去祭祀先祖呢？移风易俗，土葬改为火葬，算得上是一大进步，但相应的措施却没有及时跟上，如骨灰的如何存放，古人何处祭祀等至今没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是导致了青年人的家庭观念、宗族观念逐渐淡薄的一大原因。

2. 农妇的家务活

传统的中国农家妇女，似乎生下来就是受累、受罪的。她们为人妻、为人母，一生中付出着巨大的劳动和牺牲。除了承担生儿育女、料理全家人的吃和穿之外，还要参加田间劳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劳动力。一直以来，都称她们是“半边天”，但他们顶起的又何止半边天！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下面仅谈谈她们的针线活。

2-1谁还会做“针线活”

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棉布供应紧张，在农村家庭中，针线活是一项是极为繁琐的劳动。每个家庭主妇都必须成为针线活的“多面手”，不然就没法“过日子”。虽说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农村妇女的生活模式上还基本照旧，她们仍像千百年来先辈一样，终日没完没了的做着“针线

活”，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她们把棉花纺成线，再把线织成布，最后一针一线为全家老老少少缝制衣帽鞋袜。冬季的棉衣、夏季的单衣、春秋两季的夹衣以及被褥等一样都不能少。正如豫剧《花木兰》中所唱的：“我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针针线线都是她们连。”值得强调的是，很多针线活又是她们在昏暗的油灯下熬夜完成的。山东方言中常说的“穿不上”，也许有人会理解为“买不起穿的”，其实不仅如此，还兼表针线活儿多，不能按时做出来的语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农村中有人买了缝纫机，开始了用“洋机子”来“砸衣裳”。同时也为村里人加工衣服，加工费一般收工分。虽然这些“砸衣裳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技术上大打折扣，但用缝纫机做的总比手工缝制的要漂亮一些，所以受到广大青年人的欢迎。随着缝纫机的增多，手工缝制逐渐被替代了。同时，由于化纤工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棉布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缓和。布票取消了，农村中自己纺线织布的也就渐渐少了起来，人们开始告别了传统的老“土布”，转为买又漂亮又结实的机织的“洋布”、“卡其”、“的确良”、“涤卡”穿了。由于告别了土布，也就省略了从“棉花——纺线——经线——织布”这一套极其繁琐的程序，使得农村妇女在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现在农村的年轻妇女有谁摸过针线？谁还会做“针线活”呢？

2-2消失了的“针线筐子”等

“针线筐子”（济宁），又称“针线筐箩”（威海、德州）、“活筐箩子”（阳谷）等，指盛放针线等女工用品的器具，是每个家庭妇女必备的“百宝箱”，多用柳条精编而成或用纸浆打成。筐子里所放的东西主要包括：书本子、线板子、线棒子、剪子、尺子、针锥以及形形色色的“布拉条子”（碎布条），当然也少不了被称作“骨碌子”的木制顶针等。

“书本子”（济宁），又称“册子”（高密），当然不是用来阅读的，旧时妇女也多不识字，而是专门用来存放纸样儿、花样儿的大厚书本。纸样子主要是“鞋样子”，包括男人的和女人的、大人的和小孩的、单鞋的和棉鞋的、绣花的和不绣花的、“两块瓦”的和“一脚蹬”的各种各样。另外还有“袜样子”和“帽样子”等。

2-3“线板子”、“线棒子”和“线蛋”

三者都与线相关，是妇女针线筐子里的必备之物，但各有不同。“线板子”是缠着线的木板，“线棒子”是缠着线的木棒，而“线蛋”是用线缠绕成的线团，中间没有附着物。电影《武训传》里著名艺术家赵丹扮演武训时曾形象地用山东方言说唱：“缠线头，缠线蛋，办个义学不费难；缠线蛋，缠线头，办个义学不发愁。”妇女们大都习惯于把各种型号的针（从最小的绣花针到纳鞋底的大洋针）插在“线板子”和“线棒子”上面，而插在线蛋上的则极少。80年代以后，农村的青年人变得和城里人一样到服装店量身定做或直接买成衣穿。从那时起，农村妇女的针线活渐渐少了起来。

生活方式改变了，表达原有生活的某个词语消失了，随之与此词语相关的一批词语，包括成语、惯用语也变得难以理解了。如：

不纺线了，“棉车子”（纺车）消失了，“棉不及”（又写作“棉布剂”）、“棉穗子”无人知晓了。“一个小白棍儿，两头透气儿”（打一物）这个谜语谁能猜得出是“棉不及”？“棉不及敲磬——没音儿”这个歇后语，还有多少人能理解？（棉不及为何物？是防线用的，用棉花搓成的空心棍状棉棒。）

不做针线活了，人们对针的印象淡漠了。“心眼儿给个针鼻儿样。”是对心眼小、心胸狭窄的形象比喻，但年轻人大多感到费解。俗语“给你个棒锤，你倒认起真（针）来啦”也绕得不少人一头雾水。即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针鼻儿”就是针眼儿，“认真”就是“认针”的谐音，但又有几个人见过针眼儿、认过针呢！另，“盖体窝里打线蛋——不起球”这个歇后语比喻人的脑子不开窍，起而不发，但对不知道线蛋为何物的青少年来说，实在很难联想出来。

不织布了，织布机没有了，织布梭里的“菱荚筒”谁还记得？“拾个菱荚筒比掉个烟袋哨儿强”这个俗语有几个人还能理解？菱荚筒是什么？怎么那么不值钱？实际上是用芦苇的秆截成的，中间空，长约六七公分。由于芦苇在北方农村中随处可见，制作菱荚筒很简单，所以不值钱。

“忙得给经线儿的样”比喻的是匆匆忙忙来回不停的走动之义，但喻体“经线”是怎样一种动作形式，很多人是浑然不知，不少人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

3. 推磨

“碓头砸磨盘----实打实（石打石）”这个歇后语，现在的青少年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见过这两样东西。碓头和磨盘都是石头做的，碓头是圆形，安有一个长木柄，用来舂米的；磨盘则是磨的底盘，又称“下骑儿”（金乡），圆形。人不吃饭不行，只有谷子碾成米，粮食磨成面才能做饭，但推磨确实是个苦差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家儿女大都对推磨留下难以磨灭的苦涩印象。天津作家尹学芸曾这样描述了孩子们夜晚推磨的感受：

“那时候大人们白天干一天活，到了晚上还要推磨，这样没白没黑地干，苦劳程度可想而知。还有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白天上学，半夜里睡得正香时，被叫起来帮着推磨，真是十二分地不情愿。其实母亲也不忍心把熟睡的孩子从床上拉起来，因为她和父亲把粮食推了头一遍，第二、三遍是最费力的。在萤火虫大小的昏暗的煤油灯下，孩子们常常是边推边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不时地掉磨棍，也不时地受到大人的训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围着磨台转，转不完的圈子，筛不完的箩，家家都是如此。当时人们很希望能用牲口拉磨，但由于生产队的牲口有限，不能随便用的。人们盼望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因为磨是青石做成的，属青龙，这一天是龙升天的日子，所以便不用推磨。”（注2）这里描述的是孩子的感受，但更艰辛的应该还是母亲。《人民日报》1968.7.10写道：“许多老太太，过去围着锅台磨盘转，为一家人忙白了头。”

电影《武训传》里，著名艺术家赵丹艺术地再现了清朝末年山东义士武训为款筹办学替人推磨的艰辛场面，连同他那用山东方言说唱的“不用圪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的小曲至今令人感同身受。

至上世纪70年代初，大部分农村通了电，“电磨”（又称“小钢磨”、“打面机”）代替了石磨，人们终于从推磨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电磨的出现大大减轻了广大妇女的家务劳动强度，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劳动革命。随着石磨的消失，人们已经淡漠了与推磨有关的“磨道”、“磨棍”、“磨盘”、“磨脐子”、“磨眼”、“磨锥子”等名词以及那些表示顺序的“头遍”、“二遍”的含义，青年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头遍轻，二遍重，三遍四遍要了命”（注3）所指的究竟是哪个方面。也想象不出比喻人个子矮小为何用“磨锥子”做喻体。另外，村里的人们也已听不到那丁

丁当当的“锻磨”声，石匠们和很多与此相关的手艺人也都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与此相关的词语，包括成语、歇后语、惯用语业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4. 阶级的烙印

4-1 好成份、孬成份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许多事物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尤其是人，自出生的那一天起，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他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就被注定了，并且伴随终生。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历来是：“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因此在农村，贫雇农、下中农是“好成分”，地主、富农是“孬成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阶级成份制约着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在升学、参军、招工、入党、提干以及结婚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当中有的人虽成绩优异但不能升学，虽有能力但得不到提拔，虽积极要求进步但不能参军、入党，虽仪表堂堂但也很难和“好成分”家的子女结婚。这些严重的不平等都缘于“阶级成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样，“孬成分”的紧箍咒终于被摘下，农民们开始享受了平等地社会待遇。

如今的青年人在填写上学、招工的表格时，往往不知道在“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栏目上该如何填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家庭出身”即老百姓所说的“成分”或“家庭成分”。可以看出，时至21世纪的人事档案上仍残留着阶级的因素。

4-2 忆苦思甜

顾名思义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回忆旧社会的苦，珍惜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属于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对比，激发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加深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的热爱。据了解，自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地的忆苦思甜活动坚持了十几年。忆苦思甜，一般突出的是“忆苦”，而“思甜”往往被省略，

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城市里的忆苦思甜活动，主要有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忆苦以及吃忆苦饭等形式；农村中的忆苦思甜主要请一些逃过荒、要过饭的贫雇农老人回忆过去艰难的日子。他们大都没有文化，不少人的忆苦思甜过于程式化，即：大雪天去讨饭，因冻饿昏倒在路边，还有卖儿卖女等。也有人讲着讲着含泪批判起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所受的饥饿。遇到这种情况，村干部（大队革委会干部）就得让老人家赶紧打住，请他们下去歇着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红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就是表现这方面内容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各地还建立了不少阶级教育展览馆，全国最有名的当属泥塑《收租院》，表现的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利用收租剥削农民的情景。在山东省内则是牟平县大地主牟二黑子展览馆，牟被称为“山东的刘文彩”。今日，忆苦思甜早已远离了人们，与此相关的不少词语如“亲不亲，阶级分”、“阶级仇、血泪恨”、“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等早已鲜为人知了。

5理发、发式与头饰

5-1 剃头、推头与铰头

剃头、推头、铰头说的都是理发，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理发工具不同，二是理出来的发型不同。剃头用剃刀，推头用推子，铰头用的则是剪子（做针线活用的剪子）。从近几十年来城镇理发店铺的名称变化上我们也能看出个大致轮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剃头铺”，济宁方言有俏皮话歇后语“剃头铺关门儿——不简单（不剪蛋）”为证。剃头用的是剃刀，剃出的发型多是光头（又称“秃头”）。至60年代中期，称作“理发店”，“剃头的”的手艺人变成了“理发员”。理发工具第一次实现了“机械化”，由原始的剃刀换成了推子，发型也从传统的光头变作新兴的背头、分头、平头（统称为“洋头”）。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受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广东、深圳等地的影响，北方的理发店大多更名为“美发厅”，理发员成了“美发师”。此时的服务范围已经不再限于理发，还包括染发、烫发、护发、美容、按摩等众多项目，所用的工具也从单纯的推子、剪刀发展为成系统的现代化设备。“剃头挑子一头热”这个歇后语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让年轻人费解了。

说到北方农村的理发状况，直到60年代中期，男

人们仍大都剃光头，并且是邻里之间你帮我剃，我帮他剃，既方便又省钱。但每次剃头往往又是一件痛苦的事。这是因为：第一、大家不是剃头手艺人，剃头技术差；第二、剃头工具多是廉价品，不是专业剃刀；第三、没有足够的热水把头发浸透洗软。这样一来，剃头就成了深一刀浅一刀地“割”头发了，一个头剃下来，脑袋上往往留下好几道鲜红的血口子。单县方言中有“瓦碴子剃头——嗷嗷叫”的歇后语，真是再形象不过了。这样的痛苦大人们大都能够忍受，但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孩子们一听说给剃头，常常吓得大哭大叫，他们中的不少人宁可让母亲或祖母用剪子给剪个人见人笑的“狸花头”（参见5-3），也不愿受那份活罪。渐渐地有些赶时髦的青年人开始不再满足于剃光头，他们要留“洋头”，便只有花钱到专门的“理发店”里去“推”了。推头用的是推子，后来又有了电推子，用推子推头，不疼不痒，还可以推成自己喜欢的背头、分头或平头等各种发型。

到了80年代末，农村中基本没有剃头的了。老年人们虽然习惯于留光头，但都可以花上几毛钱舒舒服服地让理发店或他人给推推，没有人再受刀子剃头之苦了。

5-2 八岁毛

八岁毛指的是旧时男童蓄在脑后的一缕头发。这缕头发可称得上是“胎毛”，从出生一直要留到八虚岁。留八岁毛寄托着父母的期望，盼望这一撮毛把孩子永远留在这个家里，长大成人。剃八岁毛也是颇有讲究的。八虚岁这年里，只有在遇到女人吵架或母鸡斗架时才能剃掉。（至于为什么，笔者也没搞明白。）20世纪60年代末，八岁毛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残余给革了命。但到了21世纪，时隔近30多年，笔者却在动车上见到一个留着八岁毛的小朋友。这究竟是返璞归真，还是家长的“标新立异”？还难下结论，但剃八岁毛的时机——母鸡斗架之时却是很难遇到的。

5-3 狸花头

以前，农村的男孩子头发长了，带到城里的理发店去剪剪吧，爹妈一来怕耽误工夫，二来也舍不得花那一毛多钱；在村子里找邻居用刀子给剃剃吧，有的孩子又受不了那份疼。没办法，对付这样的“小长毛贼”只有动剪子了。注意，剪子不是理发专用的，而是母亲用来做针线的剪刀。这样剪出来的头发，往往长短不一，

高低不平，活像狸花猫的皮，因此人们戏称为“狸花头”。有济宁歌谣为证：“狸花头，剪子铰，出门就叫花狗咬。”为什么遭到花狗咬呢？连狗都误把孩子的头当作狸花猫了。至70年代中期，“狸花头”渐渐消失了。

5-4 “扎辫子”、“盘纂”、“挽咯咯牛子”

文化大革命前的北方农村妇女，在发型和头巾上是有严格区分的，是未婚女还是少妇，是媳妇还是婆婆，从她们的发型、头巾上就能分辨出来。概括地说，未婚女子扎辫子，至于扎一条还是两条，则没有严格规定。已婚中青年妇女一律“盘纂”、或称“绾纂”。即把头发分成数绺，在脑后盘成一个扁圆状的髻，用黑色丝网套上，再用金属叉子加以固定。老年妇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自然头发也变得稀少了，她们把所剩不多的头发拢成一束，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小髻，然后用黑色的头绳固定住。这就是“挽咯咯牛子”。笔者曾询问过老妇人为何不用叉子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她们那少许的头发已经“挂不住叉子”了。不仅发型上，在头巾上也有严格的区别。（参见5-5）

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把表现在女人发型头饰上的身份标志涤荡得干干净净。姑娘们剪掉了大辫子，少妇们也剪掉了“纂”，她们的发型趋于统一。她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再分开扎成两个把子，或拢在一起扎成一束马尾，已经难以分辨哪是大姑娘，哪是小媳妇了。至80年代，老太太们也大都剪掉了传统的“咯咯牛子”，加入到了“剪发”族的行列。

5-5 “纱手帕”和“黑布”

济宁儿歌：新年到，真热闹，

 闺女要花儿要炮，（炮：爆竹、炮仗）

 老太太要个纱手帕，

 老头儿要顶破毡帽。

儿歌表达了一家人（父母子女）对新年礼物的期望：女孩子爱美，过年时能有一朵（蜡纸做的）花戴在头上就满足了；儿子爱玩，过年时吃的穿的都无所谓，有挂鞭炮放就行了；妈妈所期待的也仅仅是能把头上顶了一年的旧“纱手帕”换成新的；而父亲的期望则更低，有一顶旧毡帽即可。

鲁南方言的“纱手帕”和“黑布”都是过去农村妇女的头巾，二者适用于不同对象，混乱不得。“纱手

帕”是长方形的黑色纱巾，是少妇们的头巾，而“黑布”是四方形的黑色平纹布，是老年妇女的头巾。与“黑布”相比，“纱手帕”要长很多，除可以包住头，还能围住脖子，质料好，价格也高。一般情况下，女人当了婆婆，便自觉地收起了“纱手帕”，换成“黑布”了。另外，未婚女子可以头上戴花，已婚妇女一般不可。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纱手帕”和“黑布”被彩色的围巾、方巾等所取代。农村妇女的已婚与未婚、少妇与老妇之间在穿戴方面的限制和界限也渐渐消失了。

6迷信活动

6-1祈雨：

古诗《锄禾》写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里禾苗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夏日久旱不雨，农家心焦如焚，此时，百姓大多设案焚香、举行声势浩大的祈雨仪式，乞求上天及龙王降雨拯救苍生。农村传统的祈雨仪式不止一种，但最常见的是，在村里的池塘边设香案、摆三牲。祈雨仪式由村中长者主持，全村老少一起焚香磕头、祈求于上天。接下来是“祭坑”，即敲锣打鼓围着池塘绕几圈。此时出现有趣的一幕，前面有敲锣打鼓者开道，紧随其后的是头顶铁锅或簸箕的麻子和疤痢脸。为了求雨，他们甘愿扮成水怪的样子受辱。后面的大人孩子纷纷往铁锅和簸箕上面泼水。据说这类祈雨仪式最早在龙王庙前举行，因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龙王庙被拆了，便移到池塘旁边。至7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祈雨”活动自动消失了。

6-2愿与：即祈求保佑，祈求的对象并不限于神灵。

当婴幼儿受到惊吓，母亲或祖母把孩子抱至厨房的锅门口灶王爷像前，求灶王爷保佑。求灶王爷把孩子惊走的魂找回来。口中一般反复念叨“回来喽！”（求的是神灵）

另外，小孩子摔倒了，磕碰了头，在场的母亲或祖母往往会在摔倒的地方用手摸一下地面，然后轻轻抚摸一下头上被磕碰的部位，口中念道：“疙瘩疙瘩你侯起，买个烧饼哄哄你。”（侯：xou42、副词，义同“别”。）（求的是疙瘩）

还有，让小孩子吃动物吃剩下的食物，从心理上把孩子看作动物的同类，使他们能像动物那样健壮泼辣，便于长大成人。有“吃鸡食，活七十”，“吃鸭食，活

八十”，“吃狗食，活九十”之说。（求的是动物）这种迷信愚昧做法，至60年代中期便销声匿迹了。

6-3《夜啼郎》贴：

婴幼儿夜啼不止，与饥渴、冷热、身体不适有关，然而过去人们错误地认为是不祥之兆，因此也不找医生诊治，只找识文断字的人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几张内容相同的帖子，张贴在村头、路旁醒目的地方，供过路的行人阅读。帖子内容如下：“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封建迷信做法，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6-4抱椿树的习俗

椿树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个树种。特点是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无节少疤，材色红润，纹理清晰，刨面光亮美观，气味芳香，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美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些对自己的体型、身高感到不满意的大姑娘和小伙子便把希望寄托在椿树上，希望借助于椿树的帮助来弥补自身胖或矮的缺憾。据说抱椿树有很多条件限制，一是要把握好时机，一年之中只有除夕夜五更时分；二是掌握准抱的方法，即首先双手抱椿树，同时小声念叨：“椿树娘，椿树娘，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来当材料，我长长来穿衣裳。”念叨完后围着树左右各转三圈后离开。之后就可以回家放心地过年了。据老年人说，抱椿树时，最忌讳遇见人，更不能跟人说话，否则就不灵验了。这种封建迷信做法，延续到70年代初。

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封建迷信作法的荒谬，自然不会再象前人那样做糊涂事了。

7. 民办教师：中国教育的奇迹

1968年至2001年的30余年间，中国农村曾经有过这样一批特殊身份的人：是教师，享受的却是农民待遇；是农民，从事的却是教育工作；是临时工，却长期任教。他们就是在中国教育史上不容忽视的“民办教师”。李风华（2010）《中国经济崛起的10大秘密——读懂中国模式》一书中给与了民办教师高度评价，指出他们“最大的功绩在于，培育了整整一代适合工业化的劳动力。基本消除了文盲。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大国里，实现了普及识字，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的侯振民、王庆余两位小学教师的一封信。他们就当

时小学的办学形式提出了“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的建议。由于这种形式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办学成本大大降低，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办学热潮。据统计，小学入学人数从1968年的1753.2万增加到1972年的36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62.6万人。在校中学生也由1968年的345.7万人猛增到1972年的1726.1万人。民办教师的数量，1976年达到440.3万多人，1977年达到471.2万，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

民办教师的报酬制度很特殊。1980年以前，实行的是“三合一”报酬制度，即：集体记工分、分配口粮、加国家（实际是公社）补助（一般5元/月）。民办教师，当初又称“工读教师”。他们当初的生活困境从下面的打油诗（注4）中可见一斑。

十二年寒窗苦，没想到回家教工读。

一天工资一毛六分五，

一盒经济烟，两块豆腐乳。（注5）

1980年以后，改为“二合一”报酬制度：地方集体自筹、加国家补助的形式。国家补助的部分从最初的每月5元增加到了200元左右，但各地的集体自筹部分，则根据各地的经济情况而定。

民办教师的特殊性还不仅这些，如以下典型描述：

“是教师却要种地，是农民却要教书；是干部又不享受干部待遇，是临时工却长期任教；学校购买国库券时把他们算作干部；村里摊派义务时把他们算作干部；教育部门定编时把它们算作干部；人事部门精简人员时又被当作临时工首当其冲；而计划内临时工转正时还把他们的排除在外。”（注6）

中国政府为改变民办教师的比重过大，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状况，于1980年12月3日发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中国开始了一个消灭民办教师的过程。90年代，各地将民办教师纷纷转正，至2001年，民办教师已经成为历史。

李风华精辟地指出：“大量庞大的民办教师构成了中国城乡分割制度中地位最为尴尬而功绩最为卓著的一个群体。”同时还对民办教师制度高度评价道：“民办教师制度是当代中国经济史上最有特点和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它应当大写在中国崛起的光辉史册上。”

8. 亲戚邻里之间的交流

8-1鸡蛋茶

历史上北方不产茶，山东方言把开水叫作“茶”，因此与开水有关的不少东西都叫做“茶～”或“～茶”。如烧开水叫“烧茶”，将开水盛入暖水瓶里叫“刮茶”，济南、西安把“油炒面”叫作“油茶”，搪瓷缸子叫“茶缸子”，盛开水的陶瓷罐叫“茶嘟噜子”，显然都与茶关系。

“鸡蛋茶”也与茶无关，是用滚开的水冲开的“鸡蛋水”。里面再加上几滴香油，少放点糖或盐，味道清香鲜美，既营养丰富又清热败火。也说不清自哪朝哪代起，在鲁西南、苏北、豫北等地，新女婿上门，岳母用“鸡蛋茶”招待“新客”（新姑爷）。从前，对于生活并不富裕的一般农家来说，鸡蛋可以说是稀罕物，所以“鸡蛋茶”也属于奢侈品，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喝就能喝上的。除了新姑爷外，害眼病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老人偶尔也能享受到。90年代以后，虽然农村的老人们偶而早上还冲碗鸡蛋茶喝喝，但大多为的是找找过去的老口味，很少用来待客了。

8-2串门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3日刊登了《蒋雯丽当导演》一文，其中引用了著名演员蒋雯丽对少年时代串门子的一段回忆：“小时候我可以端个碗就去邻居家。现在到一个地方住上3年，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剧本里一方面是我对姥爷的思念，另一方面是我想唤起一些眼下生活里缺失的东西，比如简单的快乐，温暖的人情。”（注7）这在中国广大北方地区是极其普遍的。邻里之间互相串不说，谁家来了亲戚，邻居也都去看望、陪着说话。要是没过门的媳妇或女婿来走亲戚，邻舍家更是成批成批地来看，并可以当场品头论足。院子里也常会聚集很多小孩子，不住地伸头探脑地张望。

以上从8个方面对近40年来山东农村消失的事物和词语粗线条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消失了的或正在消失的语言现象还有待于我们去整理、去研究。笔者認為这项研究不仅对语言学，对社会学、民俗学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注：

- 1) 该民谣于1986年调查单县方言时搜集。
- 2) 尹学芸（2009）
- 3) “头遍轻，二遍重，三遍四遍要了命”：比喻推磨时一遍比一遍吃力。
- 4) 该打油诗于1985年在调查金乡方言时搜集。
- 5) “经济烟”是当时最便宜的一种劣质香烟，时价一盒9分人民币。白色的烟盒上无任何商标和装饰图案。“豆腐乳”是北方人喜爱的一种咸菜，用小块豆腐做坯，经过发酵，腌制而成，时价一块3.5分人民币。
- 6) 李风华《民办教师：中国教育的奇迹》
- 7)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3日第7版

参考文献：

- 钱曾怡主编、马凤如著《金乡方言志》 齐鲁书社 2000年11月
- 单县方言志编撰委员会《单县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3月
- 董绍克、张家芝主编《山东方言词典》 语文出版社 1997年
- 梁鸿著《中国在梁庄》（《书摘》2010年第12期）
- 李风华著《民办教师：中国教育的奇迹》（《书摘》2011年第4期）
- 李东然著《蒋雯丽当导演》（《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3日第7版）
- 尹学芸《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6月
- 《人民日报》1968年7月10日
- 《中国青年报》2010年4月8日

サマリー

本文选取了“喜事与丧事”、“农妇的家务活”、“阶级的烙印”、“发型头饰”、“迷信活动”等几个侧面从语言学和社会民俗学的角度对山东省农村地区近40年来逐渐消失的部分事物和词语进行了具体分析，重点探讨这些事物和词语消失的背景条件、替代形式及演变的意义，力图客观地解读语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